

父代压力模型:父代责任的一个解释框架

刘景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在中国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代际关系逐渐成为家庭研究的主题之一,但既有研究对代际关系中父代责任的内涵、结构及影响因素缺乏系统分析。文章引入父代压力模型作为父代责任的解释框架,将父代责任与父代能力之间关系作为研究切入点,并对影响模型的相关变量,诸如子女性别与数量、父代责任链条与实现的时空条件,时间跨度与不确定性等进行了分析。进而构建了父代压力综合模型,试图利用父代压力模型展现父代责任的结构特征与总体性特点,为深入研究父代责任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父代压力模型;父代责任;父代能力;父代责任链条;空间条件;时间跨度;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C 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8)01-0081-07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8.01.01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发展,中国乡村家庭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样态。其中,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是学者们理解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围绕着家庭代际关系,很多学者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关于中国代际关系的理论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也就是说,中国在亲子关系方面,属于“抚育—赡养”型,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1]。还有一种是郭于华所提出来的代际交换理论^[2],该理论将中国亲子之间抚育和赡养关系视为一种交换关系的表达,认为亲子之间存在交换的逻辑。在具体研究中,人们主要围绕“抚育”和“赡养”之间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对代际关系流变及其后果开展相关研究。

具体而言,学者们从孝道衰落^[3]、资源分配方式^[4]、地方性共识^[5]等维度,对乡村代际关系变迁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学者基于代际关系变迁动力角度提出了国家政治力量干预论和市场冲击论等两种理论解释框架^[6],也有学者提出了影响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7],从价值基础角度分析了代际关系。更多学者是从代际关系中“抚育”与“赡养”二者之间的关系出发,以交换论视角来讨论代际关系呈现出的失衡或理性化的表现及趋势^[8-10]。可见,现有研究主要着眼于“抚育”与“赡养”之间的关系,是以关系论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当下的家庭变迁,将“抚育”及其带来的父代责任,以及“赡养”带来的子代责任,当成一种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与现实条件;没有看到父代责任或子代责任本身也是巨大的“黑箱”,需要对其进行理论分析。部分学者也对父代责任或子代责任进行了详细分析,比如,贺雪峰等就将父代责任强度划分出了5个等级^[11],王跃生将父代责任中的抚养花费划分为生活花费、教育花费、婚姻花费、医疗花费等^[12],也有学者从“人生任务”的视角,提出了父代责任的具体内容^[13]。总体来说,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抚育”与“赡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并没有将“抚育”带来的父代责任这一实体作为研究中心,父代责任始终作为一种黑箱状态存在。

笔者遵循黄宗智提出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实践出发,也就是说从紧贴真实世

界的经验出发,而后由此概括或抽象,再凭推理来发现特定经验现象间的逻辑关系^[14]。本研究按照机制研究的学术进路,希冀从大量深入的整体性经验调查中,逐步发现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15],建立中观机制,对微观经验进行结构化阐释^[16],即从经验出发,从经验中概括出关于父代责任现象间的逻辑关系,建立父代压力模型,作为父代责任的分析框架,以分析父代压力的构成因素,理解父代责任的总体性特征及结构性特点。本文调研材料来源于笔者及所在团队 2016 年 7 月在浙江、2016 年 9 月在山东、2016 年 10 月在宁夏和 2016 年 12 月在辽宁的村治模式调研。在调查中,主要采取无结构访谈的方式搜集调查资料,调查对象涵盖村干部、村小组长、村庄精英以及普通村民。

一、父代压力模型:一种解释视角

在研究代际责任所带来生活压力时,既有文献强调代际责任本身的问题,主要考虑的是无限责任所带来的持续付出,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在考虑到这种代际倾斜带来的后果时^[8],并没有考虑即使是有限责任,也会带来无限的付出,也会有完不成代际责任所带来的压力。笔者以为,代际责任本身并不构成问题,不管是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只是对责任本身的一种划分。由代际责任产生压力的原因,应该来自于人们投入到完成代际责任所需要的花费与自身能力之间的关系。

例如,假设将父代一生有效工作的年限设定为 35 年(25 岁参加工作,60 岁退休),而父代要完成其责任,则需奋斗 20 年,那么相对而言这种父代压力比较重;若父代要完成的责任是无限的,但履行这种责任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却只需 10 年,那么相对来说压力就较轻。因此,父代责任本身不构成问题,完成责任所带来的压力才是问题。基于此,笔者以为应该从父代压力(也可以说是父代责任强度^[9])这一视角出发,对父代责任进行分析,以此解释其强弱大小及影响因素。

笔者在山东某地调查时发现,在给儿子完成结婚任务后,父代以前是没有带孙子的责任,而现在还要给儿子带孙子,这样父代责任变大了,同时带来了父代压力的变大。笔者在浙江调查时发现,完成同样的父代责任,有的家庭不需要负债,就能把儿子婚事办的风风光光,并且在酒席档次和规模上都比较高;而有些家庭,由于父代能力有限,在完成父代责任之后,会带来建房、酒席等相关的债务问题,有些家庭的债务高达二十万,其中还会包括一部分高利贷。在山东调查时,一位村民讲,“有钱的老人,给孩子付完首付,会有结余当老本,没钱的老人给孩子付完首付,借了很多债,没法留老本,要自己还债。”

换言之,父代压力 P 是跟父代责任 R 成正比的,是跟父代能力 A 成反比的。父代责任越大,父代压力也就越大,父代能力越大,父代压力却越小。

如果设定完成父代责任的花费为 R ,父代能力为 A ,由此可以构建出影响父代压力的元模型,如式(1)。

$$\text{父代压力}(P) = \frac{\text{完成父代责任的花费}(R)}{\text{父代能力}(A)}, \quad \text{即 } P = \frac{R}{A} \quad (1)$$

从式(1)可以看出,只有深入研究 R (完成父代责任的花费)的构成因素以及 A (父代能力)的构成因素,才能够对 P (父代压力)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最终构建出与经验一致的父代压力模型。基于此,本文首先探讨父代责任的影响因素,然后探讨父代能力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模型进行相关的讨论。

二、父代责任的影响因素:子女性别与数量、责任链条与实现的空间条件

1. 子女性别与数量对父代责任的影响

在考虑父代责任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子代性别因素对父代责任的影响。在中国很多地方,对不同性别的子女,父代要完成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河南,一个家庭必须按照“过日子”的要求将所生育的儿子抚养长大,完成相应的“人生任务”(建房、娶媳妇和办孙子满月酒)。如果在建房、娶媳妇时产生支出或者形成了债务,都是需要父代进行偿还的^[11]。而对女儿,则没有这个要求。在宁夏平罗,儿子结婚,父代需要建房子和给彩礼,花费大约在 15~20 万元;女儿结婚,父代虽然要准备嫁妆,

但实际上,父代是将男方的彩礼转化为女方的嫁妆返回给男方,父代最多在彩礼的基础上再加 1~2 万块钱,以表心意,这个花费相对是比较廉价的。在浙江调查时发现,女方家嫁女儿,女方自己也是需要办酒席的,但是其办酒席是为了走人情账和进行社会竞争,这个花费并不能完全算是履行父代责任的付出。

假设 R_1 为儿子带来的父代责任, R_2 为女儿带来的父代责任,则父代责任就等于子女共同带来的父代责任,可以得出:

$$R = R_1 + R_2 \quad (2)$$

由此看出,由于子女性别结构的差异,不同家庭的父代责任是不太相同的,因而父代压力也应该不一样。例如,在宁夏平罗,很多双女家庭的父代都进城买房居住,而很多有两个儿子的家庭还在农村居住。原因在于,两种家庭的父代能力虽然差不多,收入来源主要是较多的人均耕地带来的丰富农业剩余,但双女家庭的父代责任比较轻,在完成父代责任之后,很多家庭有充足的资金在县城购房,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居住环境。而那些拥有儿子的家庭,由于要完成父代责任,父代并没有多少积蓄留在手中,供自己改善条件。村庄舆论也开始同情这些家庭,在评低保时,会给“儿子大户”(儿子数量为 2~3 个的家庭)适当关照,以减轻他们履行父代责任的心理负担。据村民们讲,在过去,双女家庭有很大心理负担,其原因是传宗接代观念对人们的影响,但现在双女户家庭日子过得很舒服,因为没有多少父代压力。在访谈中,一个村民讲,“我的堂弟年轻时,跟几个堂兄弟聚会喝酒时老是哭,原因在于他没有儿子,现在他再也不提(没有儿子)了,两口子在县城买房过上小康生活了。”

因此,将公式(2)代入公式(1),可以在既有模型基础上,对父代压力模型进行修正,增加性别因素对父代压力的影响,可以得出:

$$P = \frac{R_1 + R_2}{A} \quad (3)$$

除了子女的性别结构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子女的数量结构对父代压力的影响。在同样的代际责任标准下,子女的数量越多,父代压力是会更重的。贺雪峰曾描绘过 2007 年左右河南汝南农村的情况,汝南农民要为儿子建房,娶媳妇、摆满月酒,仅这三件事情就需要花费 10 万元。如果只生一个儿子,经过辛勤劳作还有可能积攒,如果有两个儿子,即使辛勤积攒也很难完成人生任务,怪不得河南汝南农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俗语^[17]。通过将子女数量结构引入模型,可以对模型进一步修正。

假设一个人有 n 个孩子,其中有 k 个儿子, $(n-k)$ 个女儿,为一个儿子完成父代责任需要花费 C_a , 为一个女儿完成父代责任需要花费 C_b , 则

$$R_1 = k \times C_a \quad (4)$$

$$R_2 = (n-k) C_b \quad (5)$$

将公式(4)、(5)代入公式(2)可得:

$$R = k \times C_a + (n-k) \times C_b \quad (6)$$

由于子女数量性别结构的差异,不同家庭的父代责任都不太一样。例如,笔者在宁夏调研时发现,在对儿子的父代责任(C_a)比较大而对女儿的父代责任(C_b)比较小时,当家庭有两个女儿的时候,父代是最容易进城买房自己住的;当家庭有一儿一女的时候,父代是不太容易进城买房给自己住的,除非已经完成了父代责任;而当有两个儿子的时候,一般家庭都在千方百计完成父代责任,家庭没有剩余资源供父代自主支配,满足自己的需要。

因此,将公式(6)代入公式(1),可以在既有模型基础上,对父代压力模型进行修正,增加性别与数量因素对父代压力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到新的数学模型:

$$P = \frac{kC_a + (n-k)C_b}{A} \quad (7)$$

2. 父代责任链条对父代责任的影响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还要考虑到父代责任链条的构成问题。通过图 1 可以看出,随着箭头方向,父代责任链条是不断延伸的,父代责任链条越多,意味着父代责任越大,当然,父代责任链条越少,

则意味着父代责任越小。

在父代责任链条延长,造成父代责任变大方面,比较明显的就是带孩子。在调查中发现,在宁夏和山东,带孩子并不是固有的父代责任。在宁夏父代责任很明显地表现在建房、娶媳妇上面,给儿子结婚娶媳妇后,父代就可以“卸下担子”了。在以前,父代只需给子女在村里建房子,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父代要给予代在县城买房子,一般情况是父代要承担首付,首付一般是 6~8 万元,贷款需要夫妻两个共同承担。为了偿还房贷,缓解生活压力,女性开始出外打工,子代在城市里无法维持男性出外打工、女性操持家务带孩子的传统分工模式,带孩子的任务就开始落在父代身上。孩子开始由爷爷奶奶带,特别是奶奶带,这就造成了奶奶进城、爷爷在农村看家和进行农业劳动的新局面。在访谈的时候,这些爷爷们都戏称自己是“老光棍”。在山东同样如此,由于子女工作很忙,因而在城镇化过程中,老人还要帮子女带孩子,“老人如果不帮子女带孩子,老人就要出请保姆的钱”,带孩子开始变成硬性要求。

在东北进行调查时,也发现父代责任链条延长的现象,这表现在对房子的要求上。在东北沈阳郊区,在过去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结婚只需要一张炕就可以了,父母并没有义务给儿子建房子,儿子刚结婚的时候,父母会给儿子提供租金,让儿子在其他人家租一间房子或一个炕居住,两三年过后,需要儿子自己出钱建房子,这在阎云翔的著作中也有体现^[18]。但现在,结婚是需要父母给儿子在郊区中心或者沈阳市城区买一套房子的。这就使得父代逐步承担起买房子的责任,父代责任的链条大大延长。由此也催生出国打工的浪潮,因为出国打工比在国内务工能获得更多的收入。一个有个 20 岁孙子的老人就说道,自己的儿子之所以要出国打工,原因就在于孙子快要结婚了,“我儿给他自己的儿挣楼房了”。

在浙江农村,父代责任链条是具有弹性的,对父代而言,最基本的责任就是抚养孩子长大、让其接受教育,并操办婚事(只是单纯操办,不支付结婚费用);最高的责任则是:抚养孩子,让孩子接受教育,操办婚事(包括支付相关费用)、购房、买车、为其立业提供基本条件。在基本责任与最高责任之间,一般父母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与意愿尽到自己的责任。这种跨度使得父代不会面临比较大的刚性压力,因为当自己能力(即 A)小的时候,父代责任(即 R)也随之变小,这样就可以减少父代压力,减轻负担。

基于此,必须要对父代责任链条进行操作化,将父代责任链条这一变量引入到父代压力模型当中。

假设 C_i 表示在对儿子的父代责任中第 i 项父代责任, C_j 表示在对女儿的父代责任中第 j 项父代责任。当 i 的项数变多时,则意味着对儿子的父代责任链条延伸,项数变少则意味着父代责任链条收缩; j 的项数变化也是同一个道理。由此可以得到:

$$C_a = \sum C_i \quad (8)$$

$$C_b = \sum C_j \quad (9)$$

因此,将公式(8)、(9)代入公式(7),可以在既有模型基础上,对父代压力模型进行修正,增加父代责任链条因素对父代压力的影响。由此可得:

$$P = \frac{k \sum C_i + (n-k) \sum C_j}{A} \quad (10)$$

3. 父代责任实现的空间条件对父代责任的影响

在考虑父代责任时,必须要将空间条件纳入到分析中来。因为同样的父代责任,在不同空间背景下,对父代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同样是房子问题,就会出现很大的不一样,这主要体现在新房地理区位引起的经济要求的不同上。在宁夏平罗农村,同样是给儿子买房子,父代虽然只负责提供首付,由于子代居住地(省会银川、中等城市石嘴山市、县城平罗)不同,房价也不尽相同,父代最终花费也是不一样的。再如在山东博山农村,现在也是要在儿子买房子拿出首付,以完成父代责任。由于很多年轻人现在博山区或者张店区打工生活,所以买房子时,要根据子女的居住地确定在哪买房子。一位被

- 1、抚育孩子长大
 - 2、让孩子接受教育
 - 3、操办婚事(不包括婚事开支)
 - 4、操办婚事中的费用开支
 - 5、购房
 - 6、买车

图 1 父代责任不完全清单

访谈者就说:“孩子在张店打工,你不可能在镇上或者在博山给他买房子吧,父母是要给孩子付首付,但到底付多少,还是要看在哪买房子,这个数目是不固定的。”

这种空间要求,在帮助带孩子方面,体现的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父代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空间照看孩子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方面。以山东某地为例,在过去,由于子代与父代都居住在农村,看孩子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精力。但现在子代在城市里,父代要帮助子代在城市里照看孩子。这项责任一般是由奶奶承担,如果父代子女数量多,又都有孩子需要照顾,那么爷爷也需要参与其中。这就造成爷爷奶奶都要进城,但要到不同的子代家庭带孩子的局面,奶奶负责照看比较小的孙子孙女,爷爷负责照看大一点的孙子孙女。最终导致父代承担着夫妻分居压力,还要与子代长期生活,处理更多的家庭关系。同样是照看孙子孙女,由于空间从农村转向了城市,父代要付出更多才能够完成自己的父代责任。

这就需要把空间条件作为影响父代压力的因素纳入到模型中。针对每一项父代责任,父代责任实现的空间条件都应该不太一样,因此,要对每一项父代责任(C_i 或 C_j) 赋予其时空影响系数(a_i 或 b_j), 用来代表在父代责任实现的不同时空条件对父代责任的影响。 $(a_i \times C_i)$ 表示,在对儿子的父代责任方面,受到时空条件影响(a_i) 的第 i 项父代责任, $(b_j \times C_j)$ 表示,在对女儿的父代责任方面,受到时空条件影响(a_j) 的第 j 项父代责任。

这样,通过引入 a_i 对公式(8)进行修正,得到:

$$C_a = \sum a_i C_i \quad (11)$$

通过引入 b_j 对公式(9)进行修正,得到:

$$C_b = \sum b_j C_j \quad (12)$$

因此,将公式(11)、(12)代入公式(7),可以在既有模型基础上,对父代压力模型进行修正,增加父代责任实现的空间条件对父代压力的影响,得出公式(13):

$$P = \frac{k \sum a_i C_i + (n-k) \sum b_j C_j}{A} \quad (13)$$

三、父代能力的影响因素:时间跨度与不确定性

在分析完父代责任之后,还需对父代能力进行深入分析。首先要确定的是,父代能力指的是什么。父代能力并不是父代整个生命周期的能力,父代能力主要是指,在代际关系三阶段^[10]中,抚育子女这一时间阶段,父代获取资源用于家庭再生产和抚育子女的能力。这一时期主要指父代成家到子代成家这一时间段,因为父代责任,比如说抚育、教育、结婚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父代要具有一定能力,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些父代责任。设定父代成家时父代有 g 岁,子代成家时父代有 h 岁,那么,父代就有 $h-g$ 年的时间完成父代责任,父代能力也就体现在这 $h-g$ 年的努力方面。

如果设定父代 t 岁的父代能力为 A_t ,那么父代能力主要是指父代从 g 岁到 h 岁之间的能力的总和。即

$$A = \sum_g^h A_t \quad (14)$$

将公式(14)代入公式(13),也就可以将时间跨度因素引入父代压力模型,可以得出修正后的模型(15):

$$P = \frac{k \sum a_i C_i + (n-k) \sum b_j C_j}{\sum_g^h A_t} \quad (15)$$

另外,要看到完成父代责任的紧迫性,随着社会转型,父代能力的时间跨度受到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表现出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性。在完成父代责任时,必须将这一变量考虑进去。

例如,在山东调研时发现,在 2005 年以前,结婚之后建房子也可以,借个房子结婚也是可以的,要求条件不是太高。并且,一家人合力建房子不成问题,“只要不懒就有活干,就能挣钱”。随着社会转

型造成婚姻要求的转变,城镇化压力和结婚压力要求必须在城市买套房子,因为,如果不买房,女方是不会答应结婚的。并且,这种时间也没有办法进行拖延,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紧迫感,父母只有倾其全力才能辅助子代在城市定居下来。

再如,在宁夏调研时发现,在 2010 年以前,一般是通过亲戚相互介绍进行相亲、结婚的,很少有自由恋爱。一般情况下,婚姻都是通过双方父母同意才定下来,男女双方的自由选择权相对较少。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年龄具有一定的控制权力,这样父代对 $h-g$ 的时间跨度有着比较高的控制能力。随着社会转型造成婚恋模式的转变,现在男女双方一般都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通过相互之间的交往,以自由恋爱形式结的婚,这种恋情的基础是双方在工作中间形成的相互吸引,这种相互吸引是一种私人情感,建立的是一种私人间亲密关系,双方父母在其中缺乏关联,有的父母就说,都是自己孩子通知自己他要结婚了,然后家长们没有什么意见,赶紧准备结婚所需要的彩礼与婚房。这样, $h-g$ 的长短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

因此,必须要把时间紧迫性这一变量引入父代压力模型中去,由此可以创造出时间紧迫系数,或者叫做时间不确定性系数 u ,用来描绘时间紧迫性对父代能力的影响。设定 u 的数值区间为 $(0,1)$,当系数越小时,不确定性越大,当系数越大时,不确定性越小。那么父代能力则是:

$$A = u \times \sum_{g} A_t \quad (16)$$

将公式(16)代入公式(13),就可以将时间不确定性引入父代压力模型,得出修正后的模型(17),即父代压力综合模型:

$$P = \frac{k \sum a_i C_i + (n-k) \sum b_j C_j}{u \times \sum_{g} A_t} \quad (17)$$

这样就得出关于父代压力的最终模型,可以将公式(17)称之为父代压力综合模型,它不仅将影响父代责任的因素,比如子女性别与数量、责任链条与实现的空间条件等涵括在内,还将影响父代能力的因素,比如时间跨度与不确定性也纳入到模型中来。这就形成了对父代压力以及父代责任的整体认识,并且,这种整体认识是一种结构性视角,能够把握父代压力的结构性特征与总体特点。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子女数量、父代责任链条长短与父代压力呈正相关,子女数量越多,父代压力越大,父代责任链条越长,父代压力越大。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子女性别结构与父代责任实现的空间条件与父代压力也密切相关,性别结构越趋向于男性为主,父代压力越大,父代责任的实现空间越趋向于等级越高的城市,父代压力越大。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时间跨度、不确定性与父代压力之间成反比关系,完成父代责任的时间跨度越小,父代压力越大,时间不确定性系数越小,父代压力越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构建出了父代压力模型,父代压力模型是对父代责任进行解释的一种分析框架。父代责任与父代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影响父代压力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父代责任和父代能力进行解构,发现子女性别数量、责任链条与实现的空间条件等是影响父代责任的关键变量,通过将其引入父代压力模型中,大大丰富了对父代责任的理解,也使父代责任的构成因子得以发现;将时间跨度与不确定性纳入到对父代能力的解释当中,能够更好地把握父代能力的变动因素。最终建立的父代压力综合模型,将这些影响因子纳入其中,能够非常直观地展现出父代压力的结构性特征。

构建父代压力模型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模型对父代责任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利用父代压力模型的结构特征,对究竟是父代责任的哪一方面出现问题进行细致的讨论,不再泛泛探讨父代责任的变迁及其表现。现有的关于代际关系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原因在于进行量化研究有效工具的匮乏。父代压力模型是进行父代压力分析的统一模型,对于不同地区的父代责任分析都能够适用。通过质性研究,找到可以进行量化操作的方式,进一步通过量化手段收集数据,对相关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从定量角度推动父代责任研究和代际关系研究,这样就实现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共同

推动相关研究的进步。

本文是实践“从真实世界的经验证据的归纳出发,借用合理猜测与推理来挖掘特定经验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来发现符合实际的洞见和建树有特定条件和界限的理论”^[14]的一种尝试,同时也是回应经验现象,进行实践性经验研究,并进行“经验→理论→价值”的不断成熟化的摸索^[19]。本文对父代压力模型进行的初步构建,只是对比较重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应根据相关数据,对建构的模型进行验证。

参 考 文 献

- [1]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6-15.
- [2] 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J].中国学术,2001(4):221-254.
- [3] 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06-113.
- [4] 唐灿.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J].浙江学刊,2005(2):201-208.
- [5] 杨华.当前我国农村代际关系均衡模式的变化——从道德性越轨和农民“命”的观念说起[J].古今农业,2007(4):4-7.
- [6] 郭俊霞.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性适应——以赣、鄂两个乡镇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 [7] 贺雪峰.代际关系价值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09(5):84-92.
- [8] 刘桂莉.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2005(6):1-8.
- [9]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从“操心”说起[J].古今农业,2007(4):1-3.
- [10] 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4):157-176.
- [11] 贺雪峰,郭俊霞.试论农村代际关系的四个维度[J].社会科学,2012(7):69-78.
- [12] 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人口研究,2008(7):13-21.
- [13] 陶自祥.论家庭继替:兼论中国农村家庭的区域类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14] 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么? [J].开放时代,2015(2):158-179.
- [15] 王德福.机制研究与社会学本土化的进路[M]//贺雪峰.华中村治研究(2016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16] 林辉煌.作为认知媒介的中观机制[M]//贺雪峰.华中村治研究(2016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17]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江海学刊,2008(4):108-113.
- [18]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19] 耿羽.机制分析的若干阶段[M]//贺雪峰.华中村治研究(2016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陈万红)